

專題報告： 思索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

組名： 紅中

組員名單： 林嘉寶 馮志豪 鄺詩淇 何欣瑩
 曾瑞麟 李梓彤 張尚芬 曹潔凝

偉大的歷史進程

香港被英國政府殖民統治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直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七十年代未開始有消息傳出中國要收回香港，以作為台灣的示範單位。而後鄧小平提出高瞻遠足的一國兩制，回歸似乎已成為鐵一般的事業。經過八十年初中英雙方多次長時間的談判和討論，終於在 1984 年，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到了 1990 年 4 月 4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正式頒佈《香港基本法》。而鄧小平曾經表示：「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香港幾個不變：社會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不搞小動作。不但九七年時不變，我們講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我很有信心，一國兩制是行得過的。」這番話本來成了香港人的定心丸，希望洗掉新中國大躍進、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負面印象。不過當 1989 年天安門的六四事件發生後，定心丸的功效盡失，六四事件對港人的衝擊是前所未有般的嚴重，看見血濃於水的政府以槍桿子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香港人對中國還可以有什麼的感覺？移民潮更一觸即發。縱使如此，香港回歸的歷史進程仍然是無可避免，香港不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你有你一國，我有我兩制

一國兩制的最弔詭之處是中國和香港分別以不同的角度出發思索這概念，兩者的焦點分別放在不同位置，結果是造成你有你的一國，我有我兩制的局面，香港與中國始終未能做到心通的交流。中國的大前提是一國，你有權選擇另一種制度作為你的遊行規則，但大前提必先得到中國的允許。舉一個例子是糾纏不清的普選

問題，香港最終是有權落實雙普選，但其時間表是受到中央政府諸多的掣肘，而且普選的尺度不能超出中央的如意算盤，這就說明中央政府所謂給與香港的另一種兩制度，是被中央所約束和規範的制度，一切也要盡在中央政府掌握之中，最明顯的分別只不過就是劃分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而已。但港人的心態正好相反，重視兩制的可貴，要保持香港獨特的一面，要堅持資本主義，提倡自由，重視法治的東方之珠，希望維持對祖國這麼近那麼遠的心態，避免成為一個中國平凡的小城市，避免陷入邊緣化的困境。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原意所重視的保持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的港式娛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神，正正就為了急凍香港 97 後環境的大氣候，讓港人放下恐共情意結的心頭大石。但事與願違，普選、釋港、二十三條立法等問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仍未達標，其感覺是實際主宰香港的「最終話事人」是中國政府。衍生出來的局面是香港和北京始終在一國和兩制之間互相角力。

誤以為香港是只有中環價值的經濟城市

香港自九七回歸後，好景不常，禽流感、金融風暴和沙士等的天災接踵而至，再加上董建華八年來八對萬五政策、數碼港、中藥港和教育改革等假大空的政策衝擊，天災人禍裹應外合困擾香港，失業率和民怨加劇，特區政府面臨嚴峻的管治危機。與此同時，中國和香港的落差很大，正值大國崛起之時，申辦奧運成功，GDP 大幅增長，一大撮的中國人開始富起來。正因如此，一國兩制在這時刻發揮前所未有的效用，開放自由行、CEPA 等措施來為處於谷底的香港舒困，結果令香港的經濟帶來復甦的跡象，港人對中央政府的印象分似乎有大的進展。但世事又豈能盡如人意，在 2003 年間，特區政府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奉中央之命推銷《二十三條基本法》，結果觸發 50 萬人上街的大規模社會運動，民怨沸騰，中產階層帶頭上街反對，堅決捍衛自由、民主、法治的核心價值。這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正好反映香港不是中央所定位的經濟城市，對政治不再是以往般的冷感，這是由於回歸後港人的身份認同抬頭，再加上本土生長的新一代逐漸取替嬰兒潮及難民社會一代成為社會的主流層，把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推到更高的層次。近年的天星、皇后、利東街、等事件都引發一連串的公民抗命，而這正反映香港新一代對於建立本土意識的追求，他們為保留自己的歷史、文化進行抗爭，清除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觀念，更甚的是見證香港人由被動的公民

漸漸轉向為積極的公民爭取其社會權利。因此，中央政府絕不能以為一些經濟的利益可以換取港人保貴的核心價值，中環價值的香港漸漸已成過去。

要了解香港核心價值

中國政府經常提倡外國勢力不應干涉中國的內政，不應該把民主、人權等視為普世價值，強加於現時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央政府的觀點就是西方應該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以中國的角度看中國問題，這樣才能把事情看透。中央雖然明白此道理，但似乎是當局者迷，每次看待香港問題時卻只懂得以中國的思維出發，不了解港人的核心價值，三次人大法釋，二十三條的立法，普選的問題，全都與港人的意願背道而馳。雖然香港在英國在百多年的統治底下沒有真正民主，但英國政府卻為香港種下民主的果實。英國政府為香港建立了高度的自由，香港人有權隨意批評政府、集會、示威或結社，而不用被政府打壓。中央政府不會明白為什麼當我們看到香港的記者在北京採訪時被公安又頸會感到怨聲載道，不明白一條國家安全法會導致 50 萬人上街，因為自由的可貴是我們的核心價值。另外，英國政府為香港建立了公平廉潔的司法制度，內地人可能不會明白為什麼香港人那麼會為官員的薪金而弄到滿成風雨，因為保持政府高透明度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英國政府為香港建立了諮詢式的民主，內地人可能不會明白為什麼香港人會為了興建西九可以用了數年的時間，他們可能還會認為香港政府的行政效率如此怠慢，但這是因為我們香港人需要一個願意聽取人民聲音和重視民意的政府，而不是一個任意妄為的高效率政府。當中央政府徹底明白香港人講自由、重法治、追求民主的核心價值時，這就會明白香港人為什麼會生氣，這就會懂得從香港出發看待香港。

一國不應是疑似兩制

歸根究底，中央政府必須對港人投下信心的一票，給港人更大的自主空間，特別是在普選問題上，雖然時間表已經落實，但當中選舉的方式、細節等仍要經過中央的考驗。香港在基本法的約束下凝造了畸形的政治生態，所以雙普選的成敗是真正決定香港人能否得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局面。否則的話，中央政府還是一意孤行，拖慢香港的民主步伐，這代表中國只能做到一國疑似兩制的四不象制度，所謂的「兩制」也只是「制衡」和「掣肘」。